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3.03.005

从《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看 毛泽东的党史研究方法

罗建华

(云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较好地体现了毛泽东基于唯物史观视域的党史研究方法。一方面,毛泽东的党史研究方法体现出一种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科学视角;另一方面,毛泽东的党史研究方法彰显了对历史学研究法、政治学研究法、比较研究法、长时段研究法和综合研究法等多维方法的整合运用。毛泽东的党史研究方法所提供的重要启示是:党史的研究应该立足当今中国的生动实践进行多重审视。

关键词: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党史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3)03-0032-09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发展壮大数十年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及相关问题显然是有发言权的。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始终格外注重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从实际出发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各方面的经验加以总结和凝练。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将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方法概括为“古今中外法”,并且基于唯物史观对如何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这一重大课题作了深入的思考和阐发^①。因此,从唯物史观的视域探讨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轨迹,理应对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及与此课题密切相关的论述加以深入解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再度思考与审视。

一 研究立场: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 科学视角

要想从根本上推动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向纵深挺进,就必须从人民中心的科学视角加以展开。

只有如此,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讨才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根基的解读与研究。而之所以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归根结底是由于唯物史观真正揭露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基本规律。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②人类社会历史不是凭空产生,其发展也不是由某种神秘力量所推动。真实存在过的社会历史,都是由具体的人的生动实践活动所创造的。更重要的是,唯物史观还表明了这种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不是由少数人展开并决定的。恩格斯曾指出:“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③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向从来都不是由少数关键人物决定的,而是由绝大多数的人们的愿望和活动方向以及对客观环境所给予的作用力综合决定的。既然如此,要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就必须站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正确立场上对其中的一系列事件和重大问题展开学理讨论。

收稿日期:2023-01-1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19XJC710004)

作者简介:罗建华(1985—),男,彝族,云南南华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①《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40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11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

首先,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必定要从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出发进行透视。从唯物史观的视域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所强调的人民中心立场,并不是要将全世界人民囊括在观察和研究的视野之中。实际上,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而言,所谓的人民中心立场首先就是全体中华儿女的立场。正如毛泽东所言:“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①毛泽东认为,倘若一味地站在国外的立场和角度去探讨,那就不是真正地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而且,即便我们为了从不同的侧面去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而不得不掌握国外的相关研究和评价,这种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审视同样需要站在中国的角度出发加以解读和反思。不仅是为解决中国问题而进行的革命与建设不能直接搬用国外现成的套路,就连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一样无法抄袭国外的模式,因为国外模式是站在中国之外的立场出发形成的。

纵观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发展壮大、从一叶扁舟到巍巍巨轮,其所有的理论与实践都聚焦于一个核心目的——解决中国问题。毛泽东在《关于共产党与党外人员的关系》中指出:“共产党的唯一任务,就在团结全体人民,奋不顾身地向前战斗,推翻民族敌人,为民族与人民谋利益,绝无任何私利可言。”^②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是如此,在豪情万丈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亦无二致。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与人民群众站在同一立场上,与人民群众有着共同的利益与诉求。事实已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借助科学有效的革命路径,将广大人民群众从备受奴役、剥削与压迫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因此,也只有从这一视角出发加以回探和审视,才能彻底看清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乃至世界受压迫民族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其次,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必须突出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之间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施舍与被施舍的关系,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良性互动关系。易言之,强调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不是要否定

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恰恰相反,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最重要的方式就是依托科学的指导理论将蕴藏于人民群众中的创造历史的巨大潜力及时而充分地激发出来,并将这种力量汇聚起来用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以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与实践加以综合考量,我们会发现,中国共产党向来都强调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譬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③毛泽东关于历史创造主体的重要论述,归根结底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及深藏其中的群众史观的浸润与滋养。

但是,对于群众史观而言,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深刻理论到毛泽东的具体表述却经过了一个不容小视的重要中介——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等维度都产生了重大的后续影响。五四运动的内核是一种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与释放,这已经是学界的一种共识。但是,这并没有也不可能否定五四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五四运动的本真精神不只是单纯的爱国主义,而是基于对民意至上和民权至上的思想觉醒的一种坚定信念,而且这一点是为当时的学生领袖从一开始就认定的^④。毛泽东之所以对五四运动多次进行肯定性评述,想必与此不无实质性关联。当然,这一点从一个侧面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主体地位的重视。因此,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进行学理研究理应突出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并从这样的视角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贡献。

再次,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研讨中国共产党历史必须正确对待重要历史人物与重大历史事件。众所周知,群众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才是创造人类社会历史的决定性主体,却也不忽视关键历史人物所发挥的非替代性重要作用。而且,广大人民群众与少数英雄人物之间并非绝对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因此,群众史观之所

①《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④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陈永明等译,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5页。

以要极力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主要是要否定将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看作少数英雄人物的杰作而完全无视群众的英雄史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强调:“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①倘若我们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比喻为一种化学反应,那么人民群众就是真正发生反应和产生变化的要素,而英雄人物则往往是充当一种催化剂的角色。然而,若没有催化剂的催化,整个化学反应的过程会十分漫长。从这个意义上说,英雄人物的作用也是不容小觑的。正如邓小平曾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引导,中国人民尽管最终也会见到光明但却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②。很明显,邓小平的论断正是肯定了毛泽东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重大催化作用。

但是,既然少数英雄人物在历史前进道路上所发挥的是一种催化剂的作用,而历史发展的方向与进程最终由人民群众所决定,那么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进程中所出现的偏差、失误与挫折就不应完全归咎于某位或某几位英雄人物。具体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必须承认这一政党如同世界上形形色色的党派一样不可避免地会在历史上犯错误。毛泽东曾指出:“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是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③我们知道,对于探索道路上遭遇的曲折,不满与怨恨并非解决问题之道,只有从大局出发,为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提出纠正错误、解决问题的有效建议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与路径,才是上上之策。正如被称之为“党内一支笔”的胡乔木所言:“愤怒出诗人,愤怒不出历史学家。”^④历史研究者所要做的显然不是一味地宣泄情绪,而是要尽可能客观地描述历史以便使自己的研究无限接近真实的历史并进而揭露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而且,严谨的历史研究者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研

究者必须注意将重要人物视为人民群众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研究,将重大历史事件放入整个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加以考察。

二 研究路径:以唯物史观为指引的多维方法

乍一看,人类社会历史似乎是杂乱无章和毫无规律性可言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深入研究人类社会之后却发现,不仅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存在着某种类似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彻底否定了以往那种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来源于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的错误观点与基调,明确地指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从根本上决定于物质基础而不是精神力量,指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就是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上的人们有目的的活动。毫无疑问,这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根本的参照和方法论启示。中国共产党历史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核心内容,对其加以研究理应在唯物史观的科学指导下进行。

(一) 历史学研究法

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伊始,新中国的宣传、教育部门就作出了明确规定,要通过宣传教育使人们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真理。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70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学习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历史学的范畴而成为一种政治“晴雨表”,甚至还曾成为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⑤。以至于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初,不少人仍不清楚中国共产党历史应当归属于政治学还是历史学。但是,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实现学术化的本质是进行一种“历史化”而不是“政治化”,因而必须继续加强史学理论修养和提升历史哲学思维能力与方法,以真正推动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的学术化和科学化水平^⑥。鉴于此,必须明确的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尽管不可能完全忽略政治维度,

①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7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4—345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6页。

④《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1页。

⑤杨奎松:《50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⑥吴志军:《党史研究学术史理论三题》,《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期。

但仍需要首先将其视为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并以一种历史主义的路径与范式进行多维思考和研究。

在毛泽东所言的“古今中外法”中,“‘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①。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确: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须按照历史发展的真实轨迹和本真面目加以梳理和审视,而不是根据主观愿望随意进行臆测和臆断。毛泽东还具体明确地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②一方面,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人才资源保障机制以及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因此,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就必须从这些重要的“前奏”开始,而不是仅从中共一大召开之日开始观察和研究。关于这一问题,日本学者石川禎浩曾在整合各种相关史料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发生在1920年11月^③。另一方面,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重大影响之下发生的,而此时的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已然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军。十月革命是在作为俄国杰出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的指导下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而五四运动虽然还不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却成为从十月革命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要“中介”。

当我们深入研读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方法问题的思考与系列论述之后会发现,毛泽东这一具体的论述非常有深意。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须将其置于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历史发展整体进程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尝试、实践与实现的历史进程中加以综合考量^④。如果将中国共产党历史从宏观的背景中强行抽取出来,对其理解必定是肤浅和片面的。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中,我们必须防止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凭借少量的回忆录或者所谓的鲜为人知的故事等对中国共产党妄加猜测和评论。英国学者柯林武德曾深刻地指出:“记忆并不是历史学,因为历史

学是某种有组织的或推理的知识,而记忆却根本不是有组织的,不是推理的。”^⑤据此,我们可以说,回忆录或许是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材料,但只有将其放入浩瀚的历史资料之中加以对比分析和逻辑推导才能最终确定其真实性。

(二) 政治学研究法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组织和党派,这一组织从革命领导团体转变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领航者,因而它自始至终都是名副其实的政党组织。依托于科学理论的指导和强大的政治号召力,这个组织从数十人发展成为九千多万的大党。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已然成为世界上最大且最强有力的执政党。因此,研究中国共产党这一强有力的政党组织的历史显然无法完全忽略从政治的视角加以深思,也应该借助一定的政治学方法对其作进一步深入研究。或者说,只有兼顾历史和政治两个维度进行研究,才能将中国共产党异质于其他党派的诸多特征加以阐明。简言之,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就是指从政治学的视角观察和剖析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各种现象^⑥。从政治学的方法与视角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就必须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政治实践方式、政治动员范式和政治体制机制建设与完善进程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与探讨。也只有从政治学的维度对这一系列内容加以研究,才能充分揭示蕴含于其中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主张与本真精神。

毛泽东曾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是要把研究的力量投放在细枝末节上,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⑦。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以及大量决策,都应当从政治学维度加以审视和再思,才能从学理的层面阐明这些决策背后的历史动因。此外,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因为一旦将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对立起来,其中一段历史的客观必然性就会受到

①《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页。

③石川禎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页。

④张明:《论党史、新中国史研究的基本原则与科学方法》,《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⑤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1页。

⑥郭德宏:《关于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几点思考和建议》,《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4期。

⑦《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页。

质疑,进而会使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连续性受到某种程度的思想认识层面的冲击。因此,习近平指出:“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关系,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①以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时期或以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这两种错误的倾向在国内外是长期存在的。这些错误的认识和倾向或者是由于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不够深入,又或者是由于其具体言论背后隐藏着某种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可以肯定的是,不从学理层面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内在连续性加以阐释,社会主义的“正统性”问题就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因此,如何看待这两个时期的关系问题就是一个事关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重大政治课题。既然如此,对此课题的研究势必要借助政治学的方法与视角加以展开。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这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的特例——对整个中国共产党历史加以学理研究都不能忽视政治学维度。

(三) 比较研究法

其一,不同视角的比较研究。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显著特征还是终极旨趣,只有在与其他党派进行对比分析时才会变得更加清晰和易于理解。毛泽东在探讨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方法时曾指出:“‘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②要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就必须将其与国外诸多党派进行比较,还需要将其放入中国与外国之间复杂关系的宏观背景中加以审思。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对毛泽东所言的“中外”不能简单地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因为它除了从字面上能够看到的基本含义以外,还蕴含着一种有意思的隐喻。正如他自己所言:“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国民党是‘外’。”^③将这些话语放到毛泽东原初的语境中,我们就会发现,毛泽东正是要强调从不同视角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性。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的极强战斗力与高效

率的社会主义建设能力与其他众多党派的某种“虚胖”和低能、低效率构成了鲜明对比。当然,中国共产党的廉洁奉公与伟大功绩也需要通过与世界上形形色色的党派进行对比来加以分析和说明。

其二,不同阶段的比较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的推进作用,应当通过与中国共产党产生之前的历史阶段进行对比研究方能得以全部呈现。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中国革命变得更加坚强有力;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中国革命的进程得以加速;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皆焕然一新。这些已成为国内外学界的一种共识,因为它们是以铁一般的事实摆在世人眼前的。得出这些基本结论,其实是基于一种不同历史阶段的比较研究,即中国共产党产生之前与之后两个历史阶段的对比分析和比较研究。其实,毛泽东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而他曾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历史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的中国历史进行了对比^④。但是,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另外一种比较研究——将中国共产党自身历史的不同阶段进行比较研究。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就将中国共产党从产生至20世纪40年代初的历史划分为大革命、内战和抗日三个时期^⑤。当然,毛泽东还对这三个历史时期从多个维度进行了对比分析。

其三,不同文献的比较研究。掌握大量的档案资料、口述材料以及回忆录等都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极为重要的基础。然而,德罗伊森却曾明确地指出:“就是最好的文献,提供给研究者的也只是片面的观点。”^⑥所以,文献只是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而不是历史本身,因为它们往往只是以碎片化的形式呈现部分历史,而不是直接展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与脉络。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就是从纷繁杂乱的历史资料中发现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要达到这一

①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5—6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6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2—406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

⑥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胡昌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目的,则必须对不同文献和史料进行比较研究并作出学理层面的综合判断。毛泽东曾指出,要深入地系统地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就需要党内和党外两种材料,而且要将“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①。可见,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领域,并不是掌握了丰富的档案资料就一定能够成为诸多历史问题的权威,更重要的是对不同历史材料进行对比分析和研究。

(四)长时段研究法

对于历史研究而言,进行碎片化和短时段研究是相对容易的,难的是对长时段历史加以整体把握和驾驭。从这个意义上讲,从微观视域进行碎片化研究尽管被一些学者视为一种新的历史研究范式,但相对于宏观视域的历史研究和对历史的整体把握而言,从微观视域切入的碎片化与短时段研究未必是一种具有实质意义的进步,更多地可能只是一种投机取巧的方式,不客气地说则是一种偷懒的方式,因为它的重点似乎并不是要弄清一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与来龙去脉,而只是简单记录和描述所谓的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但是,不从更宽广的视野和宏观的背景进行审视,对于诸多历史事件和现象我们难以下手,要做到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则更是难上加难。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深刻地指出:“马克思的天才及其影响的持久性的秘密,在于他第一个在历史长时段的基础上构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如若只是简单观察那么几个历史事件,即便那些都是极其精彩的事件也未必能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进而指出前进的基本方向。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一致的是,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英国工党代表团的谈话中说:“历史是以若干年为单位来计算的,不能以一时的议论为准。”^③在进行历史研究之时,如果我们长期只盯住一个点并将所有的研究力量投放于此,就会处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尴尬境地。要想看到庐山的全景与真面目并勾勒出它的全貌,就必须突破近距离观察所产生的局限。对于所有的历史事件,要弄清它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处的

地位和作用,就必须跳出事件本身而将其置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加以透视。

因此,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就必须有一个十分开阔的视野。这既意味着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要有一个宏观的、整体的理解与把握,也意味着我们应当将中国共产党历史放置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长河的宏观视域中加以审视^④。当然,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进行长时段研究,并不是要彻底否定短时段研究和聚焦于某个历史事件的研究及其成果。从宏观视域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进行长时段研究以及讲好党史,并不否定从微观视域进入的短时段研究,前者甚至恰恰是以后者为基础和前提的。因此,强调以长时段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真正要否定的是妄图以短时段和碎片化的研究替代长时段研究的错误倾向,而不是要否定短时段研究和碎片化研究本身。

(五)综合研究法

对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而言,综合研究方法既是指方法论本身的综合,即采用不同的方法并将通过不同方法研究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加以整合,也是指以联系的观点透视中国共产党历史,即将与中国共产党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历史纳入研究范围并作出综合判断,同时也是指将中国共产党历史本身的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历史事件以及不同历史人物联系起来进行一种综合研究和判断。方法论层面的综合研究,首先是上文已提及和论述的历史学研究法与政治学研究法的结合,其次则是在长时段研究法框架之内的短时段研究。既然人类社会历史本身就是以相互联系、相互交织的形式出现,那么对其进行研究自然也需要以联系的观点与方法加以展开。

而且,也只有以联系的观点与方法进行研究,才能尽可能全面地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则我们就只能看到历史发展的一个侧面而远非历史发展的全貌,更不可能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换句话说,不以联系的观点和综合的方法加以研究,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领域就必然会遭遇类似“盲人摸象”的错误结论和研

^①《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6页。

^②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

^④杨凤城:《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规范与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究悲剧。毛泽东就曾强调:“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①尽管有学者会以一种管窥蠡测的方式窥探某个历史事件并由此得出与以往研究迥然相异的结论而沾沾自喜,甚至还会由此获得一种在学术圈里“吸粉”的机会。但是,历史研究不是滑稽表演,并非抛出出人意料、令人拍案叫绝的结论与观点就是王者。实际上,历史研究所得出的所有结论都必须做到论从史出与史论结合,这就要求历史研究者必须本着尽可能全面地整合史料并在此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判断。

对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中将不同阶段、事件和人物加以综合研究的方法,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到习近平皆从不同侧面作出过重要论述。毛泽东曾强调,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必须以科学的方法“研究我们党在各个时期的策略路线”和“研究各个个别问题”^②。也就是说,强调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时必须注重综合研究,并不是要否定对个别时期的历史和个别问题所进行的研究,而是明确必须对不同个别时期的历史、不同个别问题和不同的历史人物进行一种比较与综合研究并作出一种综合判断。

三 重要启迪:立足当代中国实践的多重审思

纷繁复杂的历史与活生生的现实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实质性联系,一个完全不懂历史的人也就难以看懂眼前的诸多现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历史学家曾明确指出:“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学甚至可以看作是一种关于现在的研究。”^③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执政党,在长远的将来也必将继续如此。于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简单地弄清曾经发生的事情,而是要聚焦于过去发生的事情对于当前以及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所给予的重要启示。当然,必须立足当下和未来的实践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进行回探和研究,这也是前

仆后继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组织自身的建设与研究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优良传统,因为自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就明确了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继续推进现实实践。

第一,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中总结经验、发现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以不断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毛泽东早已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决不是主观主义的历史观而是致力于探寻客观规律的唯物史观^④。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十分注重在看似杂乱无章的历史事件和现象中找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核心线索与客观规律。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也应当注重从历史研究中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共产党人为发现和掌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做的研究是多方面的,其中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历史的研究则是极为重要和基础性的维度,因为从这一基础性的研究中,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找到继续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物质力量、精神动力与方法论支撑。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⑤一个并不需要作过多解释的道理是:经验的丰富程度与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与智慧不一定成正比,因为如果不从丰富的经验中总结出客观规律,那么再丰富的经验也仅仅是经验本身,而难以转化为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与智慧。有学者指出:“人作为历史的存在者,‘我’便难以否认地怀有着过去,积淀着过去。”^⑥对过去的积淀显然不是简单地积淀经验,而是积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不同维度的客观规律。因此,为做好现实工作以及更好、更稳健地走向未来而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显然必须总结历史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解释和运用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只有通过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深入研究揭示出深藏其中的客观规律,才能持续不断地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提供加速度。

①《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6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页。

③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6页。

⑤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6页。

⑥李泽厚:《历史本体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6页。

第二,通过学理研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遭遇的失误与曲折以防止重蹈历史覆辙和从教训中汲取营养。恩格斯曾说:“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①尽管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有些教训是十分惨痛的,但也恰恰是因为这些教训极为惨痛,它们能够给予中国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一种警示作用。而且,一些失误和教训经过深度反思和总结之后还可以转化为极其重要的经验,从反面角度深化我们对执政党的建设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乃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②。但是,如果有人妄图通过片面地阐述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所犯过的错误而否定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与建设进程中所作的巨大贡献,那么这种言论与观点则是需要全社会加以警惕的,因为他们往往会披着“重说历史”“重窥事实真相”等华丽的外衣刻意歪曲、抹黑和丑化中国共产党历史,而他们所有言论背后的真实政治目的则是质疑乃至妄图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

判断一个政党的好坏并不是看其是否犯过错误,而是看这一组织在犯了错误之后是将其掩盖还是极力纠正并形成一种纠错机制,归根结底则是看这个政党的一切理论与实践是否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中国共产党人犯了错误之后不是讳疾忌医,而是及时加以反思和纠正,这恰恰是其人民立场的一种生动体现,因为若一个政党犯了错误后得不到及时纠正,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就可能是难以估量甚至是无穷无尽的灾难。古人云:“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无论是个人还是一个政党,最忌讳的是犯了错误后置之不理乃至以破罐子破摔的消极态度去面对。而且,纵观全世界各政党及其历史我们很容易发现,没有哪一个政党是从未犯过错误的。正如有学者所言:“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探索本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党是不犯错误的,重要的问题是能否从错误中学习。”^③既然世界上其他政党也曾不同程度地犯过

错误,那么也就应该容许中国共产党犯某种错误,否则就是一种“双重标准”或者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犯的错误,真正理性的学者一定要以一种宽容的姿态加以论述。当然,这种以宽容的态度进行的分析和描述并不是要将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进行合理化和替其推卸责任,而是要以一种客观公正的方式进行学理研讨和阐释其历史上的失误与不足之处。而且,“我们讲不足,不是说三道四,而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吸取营养,使我们变得更聪明些,把今天要办的事情办得更好”^④。其实,也只有着眼于现实实践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研究,才是真正有生命力和有意义的。

第三,继续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以牢记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尽管从形式上看,强调牢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更多地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但是这种初心和使命却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已确立。毛泽东早就指出,中国共产党“最忠实地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⑤。而且,这样的初心与使命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本真精神的华彩呈现,因为这一政党不仅从思想理论层面建构了这样的初心与使命,更从实践维度自始至终本着这样的初心与使命加以奋斗和拼搏。因此,深入而全面地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以强调牢记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与使命的重要性,既是在唯物史观指引下的科学研究范式,也是着眼于当前实践对历史加以深入回探的正确方式。当然,牢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不仅是因为它能够对当下实践给予多重启迪与催化作用,更在于它昭示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前进方向与美好前途。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⑥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已经确立的终极旨趣是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格外注重从实际出发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9页。

②尚庆飞:《学好用好百年党史必须树立正确党史观》,《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9页。

④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

⑤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2页。

⑥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23页。

使自己的理论与实践皆十分“接地气”的同时,也非常注重防止被眼前的现实所束缚和捆绑,重视在脚踏实地的同时还要不时地“仰望星空”,以将初心使命和终极理想铭记于心。从这个意义上说,立足当今的实践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也不能只盯住眼前的现实实践,而是要借助科学理论的前瞻性对这一政党的前途与命运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展望。

需要作出说明的是,1942年6月22日,毛泽东便强调:“目前学习以三风文件为主,党史之研究暂停。”^①显而易见的是,这一时间点离《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产生还不足三个月之久。尽管此

后毛泽东也曾以不同时间、不同方式强调学习党史的重要性,甚至也曾组建党史学习委员会并亲自担任其主任^②。但是,此后的毛泽东并未从方法论层面深入探讨过关于如何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问题。可以说,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方法的探讨未必是字字珠玑和毫无瑕疵的。因此,对毛泽东相关问题的重要论述进行解读是一个基础性的研究工作,本文的逻辑框架也并不是完全按照毛泽东所阐释的思路建构起来的,而是尝试在对其深入学习和解读基础上进行的一种再思考。

On Mao Zedong's Research Methods of Party History from *How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UO Jian-hua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s article, i.e. *How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mbodies his research methods of Party histor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n the one hand, Mao Zedong's research methods of Party history embodies a scientific perspective centered on the masses of people. On the other hand, Mao Zedong's research methods of Party history shows the integrated application of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s,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s, long-term research methods, and comprehensive research methods. The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provided by Mao Zedong's research methods of Party history is that the study of the Party history should be based on the vivid practice of today's China.

Key words: Mao Zedong; *How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search methods of Party history

(责任校对 龙四清)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8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34页。